

01

延庆英烈传

(第一辑)

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

延 庆 县 民 政 局

编 者 的 话

延庆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在战争年代更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截止1981年，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，抗日战争509名，解放战争924名，建国后217名，包括抗美援朝的121名。革命烈士们所表现的无私无畏，英勇奋斗，为国为民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，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心。这些精神，不仅在战争年代需要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更加需要。

烈士们都去了，带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，却把希望留在人间。延庆人民应该踏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进，在振兴延庆经济的新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《延庆英烈传》第一辑，共收10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烈士的传记，前7位为延庆籍的同志，后3位是在延庆牺牲的其他省市的同志，分别以烈士牺牲前后为序加以编排以示纪念。

因资料奇缺，水平有限，不妥之处，望读者教正。

编者

1988年11月

繼承先烈遺志
振興延慶經濟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

杜德印

Aug 11/1989/06

目 录

杀富济贫 抗日救国

——记孙元洪烈士……………刘红印(1)

血染白龙潭

——记岳坦烈士……………刘红印(12)

铮铮铁骨 死而后已

——记卫兴顺烈士……………张进军(19)

宁死不屈的壮士

——记岳忠烈士……………张进军(27)

大义凛然 浩气长存

——记贾桂珍烈士……………李士林(36)

刘胡兰式的女英雄

——记韩桂芝烈士……………李士林(42)

热血洒在大西北

——记周元祥烈士……………刘红印(48)

徐智甫烈士传……………张进军 徐振田(56)

宁死不屈

——记李成忠烈士……………赵清学(65)

悼念王树彦同志……………王 风(69)

满江红 缅怀先烈……………刘全仁(78)

杀富济贫 抗日救国

——记孙元洪烈士

刘红印

孙元洪，又名孙来仓，1902年出生在延庆县康庄乡马坊村一个长工的家里。当他记事的时候，家里有爸爸、妈妈和他三口人，他爸爸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种着二亩沙薄地。在地里辛勤耕种一年，所打粮食无几。缴粮、买布及生活用品、都从粮里出。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就断了顿，只好用野菜和树皮充饥，苦渡时日。

孙元洪的爸爸孙秀山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多一句也不说，多一步也不走。他觉得自己穷得丁当响，走不到人跟前去；再说，一年到头忙忙碌碌，哪有时间说闲话，办闲事呢？只是安分守己地过日子。除了种地别无他路，只好给本村地主王瑞林扛长活。

孙元洪的妈妈，是个地道的小脚农村妇女，专做家务活。

孙元洪是全家唯一的独生子，他聪明好学，在11岁那年进私塾读书。天天坐在教室里，前仰后合地背着听不懂的八股文，他觉得麻烦，考试时，如果不会背，还挨棍子。他受不了憋呼，只念了一冬，骂他、打他、咋说也不去了。妈妈心疼地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咱家祖祖辈辈没有识字人，受人欺骗，吃尽了苦头，爹娘是好意，你是全家的希望啊！”

孙元洪听了安慰的话，气消了，用袄袖抹着眼泪说：“念书不自由，再说咱家这么穷，哪能忍心花钱念书呢？我想给财主放牲口去，挣了钱，给您买顿白面馒头吃。”妈妈听了心里不由一热、抱起了他。

1916年14岁的孙元洪给财主王瑞林家放骡子，村外河套，草鲜水清、他赶着20匹骡子，天天来到这里。谁知不到一个月，就丢了一匹大青骡子，这下可惹了大祸。

孙元洪吓得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地主王瑞林天天逼他爸爸赔骡子。他爸爸后悔自己不该让儿子放牲口、又恨他不争气、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人家呀！几天不见儿子，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、落个人财两空。越想越怕，亲戚、

邻村、都找遍了也没有。

一天，孙元洪突然回来了，悄悄对他妈妈说：“娘，您别不放心，我出去有事儿，饿不着。”

原来，自丢了骡子，孙元洪进退两难：回家吧，挨打、逼债，就是砸了全家的骨头也还不清；躲着吧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别无他路，只有造反。他自然想起了“闹松山、打县衙”的事——

1914年7月，延庆县知事（县长）李金刚为了发财，勾结地方绅士，把佛峪口沟里的松山林卖给一家火柴公司，激起民愤。砍伐时，被下营村武举袁湛恩为首的百姓阻拦，李金刚恼羞成怒，将袁及他的好友马庄村的王珍诱捕下狱，准备处死。城西48村百姓闻知，几天就组织了几千人，拿着棍棒、云集县城，冲进衙门找李金刚说理、拆房造反。李吓得没有办法，只好放了袁、王二人。在民众的逼迫下，他出示通告，并不再砍伐松山林。

这件事儿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他想，贪官、老财尽剥夺百姓，非整治他不可。于是，孙元洪奔向马营村的长

工单成元家、营城村长工王老五家，不几天组织了6个人。在一天晚上，他们拿着木棒偷偷来到马坊村，围住财主王瑞林，边打边问：“你还逼债不了？你还叫我们活不活了？……”打一棒子问一句。王瑞林痛得在地上打滚儿，又怕要了老命，只好哀求着说：“不叫你们赔骡子了，我闺女怕你们打她，也吓跑了。我不能拿闺女换骡子，得让她回来呀！”

虽然不叫赔骡子了，可为了生活，孙元洪和他爸爸仍给王瑞林家当长工。因结下冤仇，王瑞林绞尽脑汁地盘算，刁难他们。在人家手下，孙元洪全家提留着心过日子。为了躲避财主的报复，孙元洪在30岁那年冬天，带着他父母、妻子和儿子离开马坊村，来到涿鹿县平地泉，投靠一个朋友家住下，当了修公路的壮工。因工钱小，难以维持全家生活，第二年他又带着全家老小来到大同铁路当小工。

孙元洪在火车上当司炉，专门跑北京。他还从大同买上大烟到北京卖高价。这样来回一折腾，加上工钱，不管好坏，全家总算吃饱了。在火车上时间长了，一来二去他和司机混熟了，也学会了开火车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，呼吁：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。同年8月25日发布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在这一天，南口弃守，察哈尔省南部十县相断沦入敌手。9月初，日军80多人从南口侵入延庆城，还有一队日军从四海过来侵占永宁城。在日军一手操纵下，9月24日伪延庆县公署成立，汉奸程芳辰任伪县长，日本少佐真边任首席指导官。为加强政治军事控制，延庆的柳沟、高山寺、古城、白草洼、西拨子、下屯、佛峪口、小庄科等地修建炮楼，由日伪军及警察数十人驻守，康庄、西拨子、三堡还驻有铁路警察，都由日本人监督。延庆川建立了24个联乡，普遍建立保甲制，为日伪办事，维护其统治势力。

当时，孙元洪已是一位出色的火车司机了，专开从南口上山到青龙桥的火车头。自日军占据了这一带，一向开朗直爽的孙元洪，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。他对工人们说：“叫我为日本人开车，没门！连个火车的影子也不叫他们看见。”一天，他开着车头从南口一溜烟地向北平跑去，

日军的飞机从后边追赶，一路上扔下许多炸弹也没有炸着。他从车站下了火车，一气之下回家不干了。

1938年初，孙元洪、单成元、王老五自发地在延庆川组织了四十几个长工、长工们又分头到大纸坊屯、小纸坊屯等村及延庆南山一带串连，组织抗日自卫军。孙元洪觉得自己力量太弱，装备也差，就与高志中及其他两部分自卫军联系后，大家合在一起有400多人。高志中为司令，下有6个连、孙元洪为四连连长。因骑得大部是黑马，起名叫“黑马队”。

1938年末到1939年初，内部有分裂，孙元洪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，孙元洪为司令，王老五为参谋长。口号是“打富人，救穷人，”经常活动在延庆川和怀来县交界的地方，打敌汽车，捉伪警察，非常活跃。他常说：“我不能打败仗，如果打了败仗，队伍就不要了。”他作战勇敢，有打报不平，杀富济贫的刚强性格，人们说他有“绿林豪杰的义气。”

日伪军到处逮捕孙元洪，可连个影子也扑不着，气得他们包围了单成元的家。谁知单成元没有回来，就把他父亲单老头来个五花大绑，

由7个警察押着向康庄铁路日本宪兵队奔去，以骨肉之情来勾引单成元。经过马坊村时天色已晚，就把单老头捆在村当街戏楼里的一个大柱子上，找饭吃去了。

孙元洪知道后，象绑走自己的父亲一样着急，骑着马从延庆北乡的黑龙庙、张山营村一带，一溜烟地往南奔向马坊村。他在村边遇见一个老年人，问道：“伪警察在哪儿？”

那老年人说：“在光棍老拐子家吃饭。”

孙元洪走到门旁边偷偷往里一看，本村的伪甲长刘成明正在殷勤地端饭端菜，伪警察一声不响地吃得正香。他就着这伙全神贯注吃饭的机会，冷不防地窜上去，用左手一下子把刘成明按在地上，还没等伪警察发觉，他立即用右手开枪打死了六了。那个活着的见势不好，转身从窗户往下跳，正好掉在窗前的菜窖里，还没等他爬出来，也被打死了。孙元洪跑向戏楼里，把单老头从柱子上解下来后，他怕敌人来进行报复，于是就大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快躲躲吧，鬼子要包围村子了！”

孙元洪的黑马队，虽有绿林豪杰的义气，但终究在各方面没有经过严格整训，在日伪的

围攻下要求参加抗日队伍。这时平西根据地的蔡平同志写信与他联系，孙元洪象找到救星似的，在1939年4月，带着剩下的三十几个人来到平西蔚县桃花堡村投靠了八路军，经过整训编入晋察冀边区第一分区延怀游击支队。孙元洪任司令、刘国梁任政委、蔡平任政治部主任、陈仲武任副主任、史克宁任组织干事、邓典龙任参谋长。

1938年6月支援冀东大暴动，延怀游击支队由史克宁和参谋长带队，跟在宋时轮支队的34大队后边。敌以为他们就是34大队，经青龙桥、铁炉子村一带时，每日追赶不息。孙元洪被日军追赶时曾有七天七夜没有睡觉。一天刚要睡，通讯员来报告说：“敌人又进村了。”

孙元洪命令说：“告诉参谋长先顶住！”

通讯员说：“参谋长带队执行任务去了”

孙元洪抱着自己的机枪刚走到大门口，就见敌人从远处冲来。他狠狠放了几梭子，将敌人打了回去。在这紧急关头、他怕自己抓到的特务坏事，又带着累赘，就命令通讯员把他毙了。当通讯员又跑来报告敌人再次冲进来时，看见他趴在机枪上一动不动，以为挂了花，细

查没有血，使劲地推叫他才醒，原来是他太劳累睡着了。他醒后又将敌人打了回去，立即撤出村子。

孙元洪与敌周旋半个多月，从延庆北山来到南山后七村，一个月后奉命回到平西。

为了开辟平北根据地，1939年8月至9月间，冀察热区党委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龙(关)赤(城)工作委员会，王伍任书记，史克宁、刘国梁、耿××为委员。工委带领地方干部三十多人，部队九十多人。为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，叫熟悉情况的孙元洪当向导、他的部队编在里边，一同开往平北去找姬有铭(大海坨的伙会头目)建立根据地。

早在孙元洪投靠八路军的时候，单成元不同意，觉得没有单干自由。因怕得罪孙元洪，这个想法没敢告诉他，就暗藏在心里。不久就偷偷地告诉了在康庄铁路日本宪兵队当特务的内弟。他内弟说：“这不要紧，你在里边给我通风报信儿，我按排计划把他暗杀了。你拉出来，还怕当不了大官儿？”

单成元把孙元洪进入龙赤消息，告给了他内弟，他内弟和日本宪兵队策划了一个在小

纸坊屯村暗杀孙元洪的阴谋。

孙元洪先派的侦察员提前走了，随后是大队人马。队伍从涿县飞地三坡区的山南村出发，北行经宛平县的斋堂、镇边城。到马刨泉被敌人包围，延怀游击队大部分伤亡，后由两个警卫连补充，继续北上。夜间经康庄过铁路来到小纸坊屯村边。先派的侦察员也不见出来联系，孙元洪又第二次派侦察员进了村。这时他发现有一农民打扮的人（实为特务）站在村边，孙元洪不知其身份，就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说：“自己人，我给你们站岗。村的大庙里有你们派来的侦察员，叫孙司令去联系。”

孙元洪心里打了个转；侦察员不出来，叫我去联系？不可能。他看着这个陌生人怕上当中计，摆手不去。

那人又心生一计，督促说：“快到庙里看看去吧！你的侦察员正跟我们百姓要钱呢。”

孙元洪想，破坏群众纪律，败坏八路军名声，我孙司令是不许可的。于是他单独一人闯进庙门就说：“别害怕，我是孙元洪。”刚走到院里的窗户跟前，暗藏在屋里边的特务，从窗户眼向外打了一枪，孙元洪倒了下去。

正在村外等候的大队人马听见枪声，不知发生何事，来不急等侦察员回来汇报，就一拥闯进村里，可谁也没有看见孙元洪。

原来孙元洪带着重伤，从庙里爬到村边高粱地里牺牲了，年仅37岁。特务把他藏起来，第三天，当我们得知孙元洪牺牲的时候，他的尸体、文件、枪支等早已偷偷抬到了康庄铁路日本宪兵队献功了，单成元在里边当了特务，敌人把孙元洪的头割下来挂在康庄的大街旁边示众，以威胁百姓。

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，那就真正死掉了。

—— 鲁 迅

血染白龙潭

——记岳坦烈士

刘红印

延庆县南山大庄科乡有个白龙潭，位于昌（平）赤（城）公路的南北山峡口处西侧，距大庄科村五里地。一九四三年二月，共产党员、民兵中队长岳坦，为掩护二区区长刘文科，被伪满洲军枪杀在白龙潭里，时年二十九岁。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。

一九一四年，岳坦出生在大庄科乡水泉沟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。父亲岳老墩，为人老实、厚道、村里人都尊敬地称他为“岳老先生”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岳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穷山沟里，种着几亩山坡地，劳累一年，打下一点粮食，除纳粮外，所剩无

几，省吃俭用几个月就光了，青黄不接时，只好喝谷沫，吃野菜渡日。

岳老先生想跑小买卖挣点钱，一盘算没本钱。再加上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就更难了。只好等到秋后，卖点自产山果，弄几个零花钱。

岳老先生生气地说：“咱们种地是从土里刨食吃的人，别的道道只能做梦，没门啊！”

岳坦十多岁了，因生活难保，更无钱读书。家里只靠那几亩山坡地，养活不了全家人。岳老先生就把家里的地留给岳坦和他母亲种，他带着小儿子岳太（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军，一九五五年于山西太原牺牲）奔赤城县红沙梁村，来到岳坦的姨娘家，在他姨娘帮助下，父子二人给地主放羊，苦渡时日。

岳坦生活的年代，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，岳坦全家同样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。全家四口人，虽然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人，但仍盖不起几间房，四口人挤在一条炕上。岳坦都二十七、八岁了，还没有娶上媳妇，母亲托亲求友，到处张罗，也无结果，直到老人家闭上双眼，也没有见到儿媳妇的影子。父子三人过日子更难了，从地里回来还得点火做饭，